

导 言：

追求近代化之路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发展趋势。当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之际，回首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追溯中国人民为谋求近代化所进行的种种探索，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对中国近代国情的了解。

中国近代化（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应指从 1840 年至 1949 年间的资本主义化。对此，史学界较多的学者持这一看法。有关近代化内涵的理解，史学界有不同的表述。其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

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前进到工业化社会，与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走上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二是认为近代化是人类社会由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向近代民主制的大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变革过程，工业化、民主化、革命化，是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尽管说法不一，但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这一近代化过程，已经逐步成为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对于从近代化的视角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史学家们纷纷提出了一些看法。李文海说：“当全国人民都在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力拼搏的时候，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把自己的学术视野，较多地聚焦于以往走过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历程，或者探索今日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渊源，或者从中寻找历史依据，或者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获取历史的借鉴。”^①胡绳呼吁“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希望能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他指出：“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

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载《清史研究》1997（1），5 页。

然是很有意义的。”^①正是在史学界愈益重视对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氛围中，本书也力求以近代化为主题，来反映近代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理想进行探索的历史风貌。

许多研究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学者指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每个国家和民族，最终都要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例如，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认为，人类社会都要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但是，人类的历史进程不是同步的。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曾经辉煌过的一些文明，有的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不断弘扬，有的则衰落了。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认为，人类历史的主线是文明。他把人类存在的文明分为西方文明、儒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八种。因为历史、地理、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的不同，率先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进而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被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

另一种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即是在前者的刺激与示范下，为了回应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而后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德国、日本最为典型。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 19 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载《近代史研究》1996（2），17~18 页。

刺激因素主要是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在近代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发生过碰撞，引起暴力和冲突。由于近代西方文明占据优势，因而东方落后的国家在西方的侵略下，开始以西方为榜样，进行近代化的探索。

中国近代化的类型更为复杂。从形式上看，也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一类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 19 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

由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中国人对近代化或现代化存在某些认识误区。在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要全盘西化的观点。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其实今天西方人自己也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如，德国学者墨贝雷尔发表《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文章，批评西方把全球化理解为单方面输送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企图把西方的标准强加于亚洲的观点。他说，各个国家和历史的发展是极不相同的，以往把关于“亚洲的”和“西方的”价值观分为两极的看法是肤浅的。因为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都不存在统一的和均一的价值观。此外，价值观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①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3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与西化在理论上，这两个概念从来都是有区别的，但在应用上，人们则很少加以区分。在许多方面，这两个概念相互重叠。就非西方世界来说，不管那里的精英们怎样尽力将技术和物质变化过程与基本的价值观和规范区分开来，现代化与西化通常还是要混为一体的。不过，最近以来，非西方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已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重申。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变成历史的陈迹，随着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随着非西方社会中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随着主要西方强国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本土文化对于决定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现代化与西化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第三世界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个非西方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中叶。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后，使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逐步产生了受外国资本制约的资本主义因素。这样，一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国就变成了一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355～35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以鸦片战争为基本标志，中国进入了历史上“被动挨打”的时代。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一场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它是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与东方衰落的封建主义之间进行的首次大较量。

鸦片战争失败后，如何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中国面临着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痛定思痛，承认落后，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近代化；二是苟且偷安，对外妥协，对内实行镇压政策，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秩序和统治。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初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但没能引起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被延误了 20 年之久。此时，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外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传教、办学和行医；对内拒绝变革，实行严密控制和镇压的反动政策，致使国内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这样，终于爆发了一场带有试图建立空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色彩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不仅在实践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义，而且它提出的方案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也有自己的历史价值。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封建中国的侵略具有二重性：一是它客观上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因

素某种程度的发展；二是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撇开一些小的支流不计，大致说来，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下面四条明显的线索，或称之为四个过程：

(1) 王朝自身衰败的过程。这是指引起“王朝循环”的各种内部体制性危机和社会骚乱的再现，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机构衰落的趋势。如果没有外来的新因素介入或异乎寻常的挑战，清王朝的衰败将导致新王朝的鼎革。

(2) 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这是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下，中国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之中，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主权的丧失与变形。但半边缘化过程同时也是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引入中国、影响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过程。

(3) 革命化过程。这是指上述(1)、(2)两个过程激起中国内部产生反西方侵略与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回应。这一回应最初是传统形式和准传统形式的——民间起义和骚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逐步转变为准现代形式的和现代形式的——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

(4) 现代化过程。这是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勃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

命，从而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封建王朝腐败与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化同步进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近代化的种种努力相互交替。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前，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一方面选择了一条紧密地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的道路；一方面被迫进行近代化的种种尝试。但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近代化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实现了近代化，也就是意味着封建主义制度的终结。这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清朝末年，统治者发动的洋务运动、新政运动两次近代化变革最终走向失败，决不是偶然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近代化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反帝反封建成为贯穿近代中国的根本主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与实现近代化相辅相成，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当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人民为争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40～2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取民族独立、反帝反封建、实现近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为主要标志，中国革命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一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革命领导者不同，但在反帝反封建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人民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斗争中，先进的中国人为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和近代化而不断探索。

鸦片战争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痛定思痛，逐步认识到只有实现西方式的近代化，才能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无数仁人志士以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和实现中国富强的理想。显然，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关于中国近代化理想的探索，是在回应西方列强的挑战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些方案和理想，按其所处的历史阶段、阶级地位和性质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在现存的封建社会中，不根本改变封建的社会制度或简单地改朝换代或实用地模仿、引用西方的“长技”而企图实现近代化的理想。这种近代化理想大体上包括地主阶级革新派、农民革命的领袖以及洋务派提出的各种革新观点、改朝换代的革命理想以及洋务派等领导的早期近代化的实践。这些观点、理想以及实践，有的表面上看与近代化似乎无关，但在历史上，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具有推动作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产生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

级革新派。他们提出了种种“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学习西方的主张。这些救国方案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仍不失为先进的方案。可惜，由于他们不处在当权的地位，他们的见解不仅没有引起封建社会统治上层的重视，相反，还要受到权贵们的排斥和打击。由于清王朝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不能顺应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革潮流，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加剧，致使国内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19世纪中叶，洪秀全等人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洪秀全开始提出了建立太平天国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后来洪仁玕进一步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主张。太平天国本身虽然还不是近代化的政权，但它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迫使封建统治无法照原样统治下去。之后，洋务派吸取了早期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见解，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派是地主阶级内部较为开明的当权派别，他们既不同于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又不同于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他们主张在封建纲常秩序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变革；但当变革超过了封建纲常允许的程度，他们又反对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因此，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具有二重性：就积极的意义来说，洋务派与封建保守势力相比，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而洋务运动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历史的开端；就消极的意义而言，洋务派与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相比，具有落后的保守作用。洋务运动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洋务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社会的制度，所以它最终走向失败。这说

明，在封建主义与近代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如果不改变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幻想在中国实现近代化，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局部变革现存的封建制度，进行变法维新，从而试图实现近代化的理想。这先后包括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等提出的近代化理想。继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总结了洋务派失败的教训，发动了一场旨在变革封建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雄厚基础，特别是由于封建主义的顽固保守势力还相对强大，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了，但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维新运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镇压这场变法运动的慈禧太后也被迫实行“清末新政”。这次新政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无法照旧统治的情况下而被迫进行的一场“变法”自救运动。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进行“改制”的最后一次尝试。清末新政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清朝灭亡结束，以1906年为界通常分为变法自强和预备立宪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变法自强的领导者大多是洋务派的官僚。他们总结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企图继续领导变革。这一阶段的变革，总的思想还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无法解决封建主义与近代化的矛盾。后一阶段，预备立宪的立宪派企图在政体方面实施一些变革，但由于清王朝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致使20世纪初这

场封建末世的统治阶级的改革自救运动归于失败。当然，对这场由维新变法而引发的清末新政运动不能一笔抹杀。清末新政中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如官制改革、各种立法、发展工商业、废科举、兴学堂等，带有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色彩。

第三，对现存的封建制度进行革命或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变革与改良，从而实现近代化的理想。这种近代化理想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各种近代化方案和主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大事。他提出的三民主义政纲和实业计划，是非常系统的资产阶级近代化纲领。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稳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孙中山提出的这一纲领无法在中国付诸实践。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凭借武力，倒行逆施，致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曲折。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中国知识界又一次进行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了多次大的论争，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东西文化优劣之争、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之争、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之争、中国现代化问题之争，等等。这些论争，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近代化理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四，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压迫，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百年为之奋斗的近代化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有其名，无其实。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处在多种导向的交叉路口，至少有三种力量影响中国的演变：一是封建专制主义势力，他们希望沿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模式走下去；二是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三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三种路径能否走通，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哪一条路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并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率领人民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近代化包括政治民主化、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伟大理想。这个伟大理想，是对中国百年来先进中国人提出的各种救国救民近代化理想的科学总结。

第一章

西方挑战：东方无力的回应

一、东西文明的历史遭遇

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1792 年，是我们今天追溯中国近代化之梦无法忘怀的一年。

这一年，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遣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使团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进发。

1793 年 9 月，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的英国使团，经过长达一年的海上航行，来到了天津的大沽口。如何处理这种与

中国文明有着本质不同的东西方关系，历史地摆到了 18 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面前。

马戛尔尼这次来华肩负着打开中国门户的特殊使命。英国派他为“特使”晋见乾隆帝，除了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外，还要求在北京设立商馆。

英国的这些要求，在当时的“天子”乾隆帝看来，简直是太狂妄了。同年 9 月，马戛尔尼获准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马戛尔尼以“藩使”的头衔获准享受跪下“一条腿”给皇帝“叩礼”的殊荣（关于“一条腿”下跪，英方向英国人解释为表示独立；中方中国人解释为表示臣服）。

但是，对于英方提出的要求，乾隆帝断然予以驳回。乾隆帝鉴于英国特使多次“陈乞”之情，这次破例给英王下了两道“敕谕”。在第一个“敕谕”中说，尔国王远在重洋，特遣使航海前来，叩祝万寿，恭顺之诚，深感嘉许。但尔国王要派人常居天朝，此举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在第二个“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用不着与“外夷”互通有无。为了表示“天朝”对天下“藩国”的一视同仁和宽宏大量，乾隆帝特许英国人在澳门设立洋行进行买卖。

乾隆帝的“敕谕”无疑给了马戛尔尼当头一棒，英国特使的来华使命没有完成，只好悻悻打道回府。

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曾经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直到 16 和 17 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 19 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 20 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①这的确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群“蓝眼睛、黄头发”的陌生人，从遥远的西方向东方走来，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意味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为英国率先发起了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近代化”。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其迅速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而资本主义工业化促使商品生产魔术般地增长，迫切需要进行海外扩张，特别是打开中国的门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

[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前言”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发 到处建立联系。”^① 因此，马戛尔尼这次东方之行具有历史的意义，它是世界近代史上东西方相遇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次历史相遇则代表着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即一方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强国；另一方是封建主义的帝国。

凭心而论，乾隆帝统治时期的清王朝正处在颠峰状态，综合国力并不算弱。如果乾隆帝能够从马戛尔尼带来的西方社会新的信息中，对 18 世纪中国之外的世界变化有所认识，废除多年实行的“半闭关”的国策，妥善处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使中国参与到世界的贸易中去，说不定中国可以避免后来鸦片战争“落后挨打”的悲剧。

然而。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历史的假设无法重复。

“天朝”惟我独尊

乾隆帝驳回了英王的要求，继续陶醉在雄视四海、不可一世的老大幻觉之中。

乾隆帝的陶醉是有原因的。中国是个背靠大陆腹地、面向大海的大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当成“天下”的中心。因为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领先地位，历代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无不“先天”地带有一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封建社会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2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